Source: *Lianhe Zaobao*, p20
Date: 29 December 2023

郭良平专栏

中国情势的山雨欲来

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的国庆群众大会，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来形容近期的国际形势。用它来描述中国国内的形势也贴切。回想11年前，新上任的中国第五代领导层可谓春风得意：中国刚经历了增长的“黄金十年”，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全面追赶、局部超越的局面，有了晚清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，而且不是历史上那种闭关锁国中的盲目自信，而是一种看上去有根有据的全面自信。表现在当时的流行语上，就是“东升西降”“风景这边独好”“理论、道路、制度自信”，民族复兴几乎伸手可及。

然而近来形势急转直下，中国引以自豪的增长速度不再，长期被高增长掩盖了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；国际环境更是险恶，产业链外迁和发达国家推行高端脱钩，增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。中美经济差距连年扩大，中国像日本那样再次被甩在后边并非神话。昨日如梦，今非昔比，一股悲观情绪笼罩神州大地，当局甚至禁止大家谈论困境，停止发布失业数字，以免信心进一步下滑。

如果只是周期性经济衰退倒也罢了，但它还伴随着相当普遍的对现实的不满、反思和质疑。

这种情绪渗透到最高层：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卸任前不久视察广东时宣称：“长江黄河不会倒流”；他在国务院卸任典礼上不无所指地说：“人在干，天在看”。

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以及大批中产专业技术人员纷纷移民，或将财产、子女和配偶转移到国外，为自己备下退路。据报道，美墨边境近来聚集了大批绕道拉美来的中国偷渡者。同以往底层移民不同，这批人衣冠楚楚，显然是有成就有地位的阶层也加入了非法移民队伍。

人心思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主因，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胜出，都不大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，因为双方的工具箱里都没有合适的工具，都缺乏新思维。

缺乏底气的自由派

中国的自由派有个特点：永远在野、永远弱势。10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揽子改革方案，是他们迄今取得的最辉煌成就。但这个方案的关键部分，因为同意识形态主调相悖，一直处于被搁置状态。自由派在体制内缺乏根基，稍显风头就会遇到体制的制约和体制内外利益集团的反弹。在经历十余年的批判打压后，他们难掀波浪。

但他们近来明显活跃起来。目前的困境让他们看到机会，有勇气对现状大加鞭挞。听其言大有“我早就告诉你了”的感觉，似乎胸有成竹。但这是假象，像大多数中共的批评者一样，他们也富于不在其位的奢谈。他们的方向感并没有超出“苏东波”时的自由派：那时的他们对目标模式有一种盲目共识——西化，向欧美看齐，以欧美模式来改造现实。他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，被嘲讽为“公知”；但如果真正上了台，面对现实问题时，就可能犯戈尔巴乔夫式的理想主义错误。

同30年前比，他们今天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一个是他们的楷模——美英等老牌自由主义国家，也正面临巨大困难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；按照他们的主张，就会毫无悬念地走入西方目前的困境。另一个是共产党不仅没有倒，还大权在握，并有雄厚的物质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他们政治上的天真表现为一条路走到黑，例如有人公开主张放手让贫富差距扩大，直到老百姓造反。

现代化诞生于西方文明，中国现代化必须吸足西方文明的精华方可持续，比如权力制衡和监督，法治和司法独立，民主、人权、思想自由和负责的言论自由等，这些仍然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。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权保障，任何人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，资本外逃和人才外流就会是常态。

自由派最大的底气来自西方的共鸣，但这主要是道义上的鼓励，无法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。由于对弊端日显的西方模式批判不足，他们以改革派面貌出现时虽有号召力，也只是纠集起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，向西方模式盲目挺进。

老马识途的当权派

虽然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，但中国政治倒流形势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，因为有体制内的利益结构和体制外的群众基础支撑。前总理温家宝离任时当着全世界警告：政治体制不改革，经济改革的成就也会丧失，文革也可能重演。然而当时中国上升势头正盛，许多人都没有能力清楚认识到体制的缺陷，反而笼统地以为是这个体制成就了中国崛起。现在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，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，都同体制改革不彻底相关。这些年的左摆既有逻辑的必然，也有习惯的自然。

必然性来自意识形态正统，而意识形态又是列宁式政党的权力结构、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基础。同一般政党不同，列宁党的功能不是表达社会利益，而是实现既定理想。这是个走在群众前面的先锋党，要求党员有信仰、有高尚情操和先锋模范作用，党组织有高度的纪律性，全党能够统一思想，统一意志，统一纲领，统一行动。然而市场化全面冲击了这个模式，党员干部纷纷追逐私利，无视党纪，贪污腐败蔓延。

中共的应对方法不是改变党建模式以适应新情况，而是克己复礼，努力恢复旧时的“理想状态”。2012年11月17日，刚上台两天的习近平称：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的灵魂，否则精神上就会“缺钙”、得“软骨病”，就会腐化堕落。“现实生活中，一些党员、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说到底是信仰迷茫、精神迷失”，还提出：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。这个逻辑导致系统性的回归正统，从思想意识、组织形式、生活和工作作风，到行使权力的方式——党的一元化领导、四个意识、两个维护、两个确立等，还有群众路线、批评与自我批评、辩证法、矛盾论；整风，政治学习，严肃党纪，反腐倡廉，提倡牺牲奉献精神，树立英雄模范等。

这些都可敬可嘉，但不可持续。这个垄断了权力，掌控着巨量资源，有1亿党员的大党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体；中国中产阶级的中坚在体制内，维护党治的现形态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在社会上，40年的高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，但也造成世风日下、阶级分化、财富不均、社会不公，使一些草根民众追怀毛泽东时代。传统式党建有其必然性，也在客观上为极左势力营造有利条件。

从历史惯性来讲，当前领导层都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，文革破坏了所受教育的系统和完整性。他们对毛时代形成的传统和理想主义是有感情的，对旧的运作方式驾轻就熟；遇到问题除了旧工具箱外，不知道其他可能性。党内外左的势力利用惯性将改革推向复旧。

所以，中国左转的条件是全面的：从政治制度到领导人成长背景，从群众基础到文化传统、意识形态等一应俱全。尽管中共很早就发誓：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，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”，但老马识途，溜达溜达着就往回走了。

创建第三模式

左派在蹈毛的覆辙，右派在蹈西方的覆辙，所以创建第三种模式或闯出第三条路，是当务之急。

鉴于上述混沌状况，很难讲山雨过后会马上晴空万里——也许仍是乱云飞渡，还可能进入梅雨季。中国这么摇摆下去也未必输——别的国家可能更烂。但成了比烂，就不可能推动人类文明达到新高峰。

创新模式任务艰巨，须要各方面长期努力。但有几个出发点很关键：首先是学足西方文明，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真正现代化和融入国际社会；其次是解放思想，冲破几个关键的意识形态障碍；最后也最要紧的，是克服旧模式造成的现实危险。

现代化诞生于西方文明，中国现代化必须吸足西方文明的精华方可持续，比如权力制衡和监督，法治和司法独立，民主、人权、思想自由和负责的言论自由等，这些仍然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。只要有公平正义，每个人（不分阶级）的生命、财产、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能够得到可靠保障，这个社会就坏不到哪儿去；它就能保得住良知、留得住人才和财富，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经得起危机和灾变。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权保障，任何人，无论如何富有，无论怎样位高权重，无论有多成功，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，资本外逃和人才外流就会是常态。

党建与时俱进，可从一些明显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条框打开突破口，如剥削、消灭私有制、阶级斗争、无产阶级专政等。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了如何做好市场经济，列宁党模式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枷锁。中国现行的宪法保护私有财产、承认合法的资本收入是为了发展生产力，但也因此产生一大批有产阶级。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他们都是剥削者，是专政的对象；但他们同时又是先进生产力的化身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论创新问题。

但当务之急是克服先锋党模式的通病：个人专断。这个模式容易产生无知无畏的“伟大领袖”，用他/她的“光辉思想”到处发“最高指示”。他们任人唯亲，而不是鼓励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去独当一面、去闯去创——生怕别人的风头盖过自己。“伟大领袖模式”在毛时代最典型，也持续最久，但后果是灾难性的。在一个创新决定一切的年代，落入一言堂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

中国的制度可塑性强，做对了就能量无限、前途光明，关键要把握好方向和度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

Source: Lianhe Zaobao © SPH Media Limited.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.